

来路与去路:宋元讲史话本与 经史演义的通俗化拓展

徐大军

摘要:宋元时期的讲史话本与史评类著作共同蕴含的按鉴编写、历史讲义、述史求理等属性因素,关联着当时历史著述的一个文化语境、一条承续脉线。前者是经筵制度引领的经史讲读活动在市井社会通俗化、娱乐化拓展的结果,后者是经筵制度引领的经史讲读活动在史学领域义理化、通俗平易化拓展的结果。据此而言,讲史话本乃属于经史演义通俗化拓展路径上派生、分离出来的通俗历史编写。相对于当时正统的历史著述,它在编年体例、按史演义、述史求理等方面仍然依循历史著述的路径,但在取材上、表述上则存在偏离历史著述的不守本分之处。对于后世的历史演义小说来说,这些不守本分之处具有开拓意义,孕育了脱离历史领域而在文学领域另辟洞天的促动因子,成为历史演义小说得以生长的起始点和催化剂。

关键词:讲史话本;经史演义;义理化;通俗化

作者简介:徐大军,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 311121)

DOI编码: 10.19667/j.cnki.cn23-1070/c.2025.04.013

对于《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全相平话五种”这类历史题材的宋元通俗叙事文本,我们现在习惯称之为“讲史话本”,也普遍立足于小说,具体为话本小说、通俗小说或白话小说,来寻绎其身份与血统——因明清评话伎艺而寻绎到“平话”伎艺,因明清历史演义而寻绎到“讲史话本”。这属于现代学术体系对其定性归类由下而上、以后律前考察视角的血统追认,也是“话本小说”这一概念一步步催赶出来的血缘关系论定。其实,当时的知识格局并无“话本小说”这个类别或者“讲史平话”这个伎艺,而且,我们也很容易看出这类作品作为话本小说或通俗小说的不纯粹。^①这就提示我们要反思宋元讲史话本的文类属性,它们必然是小说的属性和类别吗?或者说当时的编写者自认为是在编写小说吗?进而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立足于宋元时期的知识格局,我们称之为“讲史话本”的这类文本,它们是从什么类别、什么路径走出来的书面编写?这个“来路”问题即引导我们进一步辨析宋元讲史话本的文类属性

^① 孙楷第认为:“(《宣和遗事》)虽掺合评话语气,实书肆杂凑之书,非纯粹通俗小说也。”(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页。)严敦易认为:“(《宣和遗事》)并不能认为是一部说话的话本,它显然是钞撮旧籍而成,夹杂有语体和文言,参差不一。”(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93页。)

和生成路径,由此切实认识它们为何能出现以及为何能以如此面貌出现的多维参与力量。

一、关于讲史话本“来路”问题的反思

促使我们重审宋元讲史话本“来路”问题的因素,除了前文提及的对于“以后律前”考察视角的警惕,还有以下三点。

其一,史学界对其文本属性的认定。史学界有观点认为,宋元讲史话本是一种平民化的通俗史学作品,与之亲缘的“讲史”伎艺则是一种通俗的史学活动。舒焚《两宋说话人讲史的史学意义》一文就明确指出,“讲史”伎艺是一种史学的普及活动,“说话人的讲史,他们以及与他们有着密切联系的文人的抄录和编写讲史话本,就不仅仅是一种文艺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史学活动”^①。这种观点虽遭批评,但一直有支持者。^②据此而言,对于这类文本,“话本小说”只是对其属性认识的其中一种,而且并不是它必然的、唯一的属性认定,或者说并不是它必然的、唯一的身份标签。

其二,历代文献对其著录归类的情况。宋元文献并无对讲史话本的著录或归类,明代书目文献仅著录有《宣和遗事》,见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六“史杂”类、晁瑬《晁氏宝文堂书目》卷中“子杂”类、高儒《百川书志》卷五史部“传记”类。至于“平话”一词,明清人常把它与“评话”混用,指的是一种口头讲唱故事的曲艺形式;即使谈及元代,亦多称“评话”,这是以当时的“评话”概念来逆推元代的“平话”。比如《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杂史类”存目三叙录明人郭子章《平播始末》有附注:“案《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所收至夥,皆优人以前代轶事敷衍成文而口说之。”^③所谓“《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明姚广孝等编《永乐大典目录》明确作“评话”,其卷四六“话”字部收“评话”凡二十六卷(卷17636至卷17661),^④惜未列出作品名目。据此,宋元讲史话本题名中的“平话”一词,并非指向一个伎艺样式、文体类型或编撰体例,而是一个与当时“直说”相类的书面编写的表达方式。^⑤

其三,讲史话本的取材来源与处理材料的方式。对于宋元讲史话本的定性归类,“话本小说”持论者自有其秉持的观念、立场和框架,但文本形态肯定是一个核心性、基础性的文献依据,其中明显的说书场景因素自然具有潜在的引导作用,让阅读者认为这些讲史话本乃来自伎艺表演内容的记录整理。但事实并不尽然,比如下面一例:

话说田儼者,故齐王族也。儼从弟田荣,荣弟田横,皆豪杰人。陈王令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太守。田儼佯缚其奴之庭,欲谒见狄令,因击杀狄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也。”田儼遂自立为齐王,发兵以击周市。周市军还去。田儼率兵东略齐地。^⑥

这是《秦并六国平话》下卷的一个段落,它关于田儼事迹的叙述乃抄录《史记》卷九四《田儼列传》的原文,^⑦只是以说唱伎艺常用的格套语“话说”领起而已。如此说话伎艺格式与文言叙述内容的简单组合形态,从叙述体制上看,就是以说话伎艺格式框套文言叙述内容的书面编写体例;从叙事架构上看,就

① 舒焚:《两宋说话人讲史的史学意义》,《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第99页。

② 参见李小树:《宋代商业性讲史的兴起与通俗史学的发展》,《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第116—122页;邓锐:《宋元讲史平话的史学史研究价值》,《江淮论坛》2008年第4期,第183—188页。

③ 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四,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85页。

④ 姚广孝等:《永乐大典目录》,解缙等:《永乐大典》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49—550页。

⑤ 参见徐大军:《元代的直说作品与书面白话著述的自觉》,《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4期,第307—334页。

⑥ 《秦并六国平话》下卷,《宋元平话集》,丁锡根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5—656页。

⑦ 司马迁《史记》卷九四《田儼列传》记:“田儼者,狄人也,故齐王田氏族也。儼从弟田荣,荣弟田横,皆豪,宗强,能得人。陈涉之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儼佯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见狄令,因击杀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儼,田氏,当王。’遂自立为齐王,发兵以击周市。周市军还去,田儼因率兵东略定齐地。”(司马迁:《田儼列传》,《史记》卷九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643页。)

是把现成的文言作品或段落挪放到一个虚拟的说书场景中。对于这样的混合形态,如果着眼于说书场景因素,就会认为其中置放的故事文本有着说唱伎艺的底本或记录本属性;而如果着眼于文言叙述内容,就能明确认识到它们不是来自伎艺说唱内容的记录整理,而是根据史书材料的书面编写。具体如何据史书编写,兹以《五代史平话》为例,理析一下它们的取材来源以及处理材料的方式。

关于取材来源,《五代史平话》大体上是依据史书加工而成,有学者甚至认为它“约四分之三的篇幅,系直接依据史书加工而成”^①。所据史书,论者普遍认为是《资治通鉴》,宁希元、丁锡根曾将它与《资治通鉴》五代史部分对勘,判定大部分内容乃据《资治通鉴》改编而成,但其编写又在体裁、语言和细节描写等方面受到民间讲史伎艺的影响;^②而罗筱玉则进一步指出应是依据《资治通鉴纲目》《五代史详节》《史记》《后汉书》《历代通略》等史书。^③

关于处理材料的方式,可参《五代唐史平话》卷上插叙“汉光武帝渡滹沱河”一节。晋王李存勖因冬日冰坚,得以顺利率军渡河,遂自夸“正与汉光武滹沱冰坚相似”,编者在此处插引相关历史典故以作解释,而所用材料乃出自《后汉书》卷二〇《王霸传》:

话说里,说那汉光武南驰,传说王郎军兵在后,诸军皆有恐惧的心。及至滹沱河,有候吏还报:“河水渐流,无舡怎生得渡?”官属忧恐。光武遣那王霸驰至河探听。霸恐惊动众军,托言冰坚可渡。光武因笑道:“候吏果是谎说。”及到河次,河冰果合,光武诸军乃得渡河;有数骑过未了,而冰解。王霸谢道:“明公至德,获神灵之祐,虽武王白鱼之瑞,何以加此?”光武谓官属言:“王霸权变以济事,亦天瑞也。”晋王闻冰坚,乃引此事自比。^④

光武即南驰至下曲阳。传闻王郎兵在后,从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还白河水流渐,无船,不可济。官属大惧。光武令霸往视之。霸恐惊众,欲且前,阻水,还即诡曰:“冰坚可渡。”官属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语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护度,未毕数骑而冰解。光武谓霸曰:“安吾众得济免者,卿之力也。”霸谢曰:“此明公至德,神灵之祐,虽武王白鱼之应,无以加此。”光武谓官属曰:“王霸权变以济事,殆天瑞也。”以为军正,爵关内侯。^⑤

两相对照,可以看出《五代唐史平话》这段文字乃据《后汉书》原文编成,并混合使用了三种处理史书材料的方式:一是据史书抄录(标实线者),二是据史书剪辑(标波浪线者),三是据史书白话翻述(标虚线者)。这是宋元讲史话本普遍存在的三种处理史书材料的方式,只是这段文字很典型地混合使用了它们,而在更多情况下则是单独使用。

《五代史平话》使用的这三种处理史书材料的方式在其他讲史话本中也普遍存在。比如学界普遍认为《宣和遗事》各节故事皆有所本之野史杂传,乃是经历南宋覆亡者对当时各种野史、杂传、笔记材料的辑录汇编。鲁迅即指出后集“靖康元年正月初六日”以下叙“金灭北宋以至高宗定都临安”一节,乃取用《南烬纪闻》《窃愤录》《窃愤续录》而小有删节。^⑥胡士莹指出前集叙“王安石变法”一节,乃节录南宋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而成。^⑦汪仲贤则明确指出它所撮抄、杂凑的内容材料乃来自《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九朝编年备要》《钱塘遗事》《南烬纪闻》《窃愤录》《皇朝大事纪讲义》等书史文传,并总结了

① 周兆新:《讲史平话的两大流派》,《周兆新元明清小说戏曲论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276页。

② 参见宁希元:《〈五代史平话〉为金人所作考》,《文献》1989年第1期,第16—27页;丁锡根:《〈五代史平话〉成书考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第68页。

③ 罗筱玉:《〈新编五代史平话〉成书探源》,《文学遗产》2012年第6期,第86—97页。

④ 《五代唐史平话》,《宋元平话集》,丁锡根点校,第82页。

⑤ 范晔:《王霸传》,《后汉书》卷二〇,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735页。

⑥ 鲁迅:《宋元之拟话本》,《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三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84页。

⑦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899页。

它转录书史文传材料的四种方法:直录法、节录法、夹录法、译录法。^①即使“全相平话五种”有些内容已表现出故事情节乃出于增饰和虚构,而非谨按史书敷衍,但仍有内容属于抄录史书旧籍而成。比如《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的“孟子至齐”一节是抄录《孟子·梁惠王上》,“孙子回朝”一节、“燕王筑黄金台招贤”一节则分别是节录《孟子·梁惠王上》和《战国策·燕策》而成。又如《秦并六国平话》在入话诗中自称“闲将《史记》细铺陈”^②,其内容也确实存在大段抄录《史记》的现象,卷上“荆轲刺秦王”一节乃据《刺客列传》荆轲部分抄撮而成,卷下“田儼事迹”一节则据《田儼列传》相关原文直接抄录。

上面所列宋元讲史话本据史书原文的抄录、节略或白话翻述现象,明确体现了它们“殆同史抄”的编写方式,只是又简单混合了“话说”、入话、散场诗这些属于伎艺口演体制的成分。据此而言,这类文本肯定不能算是讲史伎艺口演内容的书录整理,而是属于原生性的书面编写,并且立足于书面编写而简单取用了口头叙事伎艺的体制格套。

二、什么文类属性的书面编写

南宋罗烨《醉翁谈录》有一段“演史讲经并可通用”的格套语“小说引子”,其中标榜的“得其兴废,谨按史书”^③一语,不仅是“讲史”伎艺自抬身价的口号,也是当时历史讲义类、演义类著述普遍践行的宗旨。《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这类通俗历史著述也不例外。

先看“谨按史书”。《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据史书编写的表现,除了上文所及内容取材上直接来源于史书,处理材料方式上直接抄录或节略于史书原文,还有就是总体架构上使用编年纪事的史书体例。

《五代史平话》不但内容上大量取材《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而且叙述体例上也取资于它们,丁锡根即指出,《五代史平话》“主要部分的内容皆取材《通鉴》,其结构脉络亦多依傍《通鉴》体例”^④。所谓“《通鉴》体例”,就是指史书撰写的编年纪事、以事系年方式。比如《五代唐史平话》卷上所示:

天祐十一年,赵王镒与王处直各遣使推晋王为尚书令。……

天祐十二年,梁天雄节度使杨师厚矜夸己功,置一军号做银枪效节都,有数千人,欲复还旧时牙兵之盛。……

天祐十三年,刘鄩帅大军攻晋魏州,坚守城壁不出战。……

天祐十四年,契丹阿保机自称皇帝,国人号之为天皇王,以妻述律氏为皇后。……^⑤

这种叙述架构完全按照《通鉴》的编年纪事体例,只是在文本形态上未作明确的标识。

而在《宣和遗事》中,无论在文本形态上,还是在材料内容上,编年纪事的体例都更为鲜明。首先,在文本形态上,编年体叙述的格式有清晰标识,具体作法是年号用阴文标识,其下按月列述相关事件提要。其次,编年之下所系事件,会另外汇集相关材料对其作进一步补充或阐释,以拓展对此事件的认识。比如后集记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徽宗面临危局,下诏退位,然后列述了各种材料来说明徽宗的荒淫乱政以及蔡京、童贯等六贼的混乱纲纪,其中有徽宗“下诏罪己求言”的手诏、太学生陈东上书乞诛六贼以谢天下的奏章,并引用了刘屏山的咏史诗《汴京纪事》三首以及樊楼、蓬蓬歌、李师师流落湖湘间等掌故。由此可见,《宣和遗事》的编年纪事,具体年月之下所系内容,既有事件,也有评论;而所系之事,既有本年发生的事件,也有其他年份发生的事件,并不完全是对一个事件前后因果的叙述,而是针对某一大事件,汇集相关记载、传说、掌故、评议等材料,以作阐释、参照或补充,彼此之间并不相互融

① 汪仲贤:《宣和遗事考证》,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下册,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第7—10页。

② 《秦并六国平话》上卷,《宋元平话集》,丁锡根点校,第561页。

③ 罗烨:《醉翁谈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3页。

④ 丁锡根:《〈五代史平话〉成书考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第67页。

⑤ 《五代唐史平话》卷上,《宋元平话集》,丁锡根点校,第76、76、79、80页。

合,并不前后照应。这与其说是历史叙述,不如说是历史讲义,尤其在叙述结构上正应合了南宋流行的史家著述之纲目体。

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所创史书之纲目体影响深远,追随者不绝,当时南宋史家即有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佚名《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等踵迹其后。其体例为“纲”系事件提要,“目”结具体叙事,以便读者领其要而会其详。《宣和遗事》不但采用了这种编年系事的叙述架构,还直接抄录了纲目体史书《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的文字内容:

夏四月,召蔡京入内苑赐宴。辅臣亲王,皆得与席。徽宗亲为之记,其略曰……执事者以宝器进,徽宗酌酒以赐,命皇子嘉王楷宣劝。又以惠山泉、建溪异毫盏,烹新贡太平嘉瑞茶,赐蔡京饮之。徽宗又道:“日未晡,可令奏乐殿上。”笙、竽、琵琶、箜篌、方响、箏、箫登陆合奏,宫娥妙舞。徽宗又曰:“可起观。”群臣凭栏以观。又命宫娥抚琴擘阮,群臣终宴尽醉。^①

这段内容见于《宣和遗事》前集政和二年(1112),又见于《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八政和二年“夏四月,燕蔡京内苑”一节,^②二者文字基本相同,明显是《宣和遗事》抄引此书;其中“夏四月,燕蔡京内苑”一句为“纲”,下列事件过程叙述为“目”。这说明《宣和遗事》的编者使用了这种编年纲目体的框架,并在此框架中撮抄、剪辑了现成的书史文传内容,只是它取用的材料并非仅限正史,而是旁及野史、小说、传说;表述方式也并非仅作史书原文抄录,而是作了通俗化处理,甚至使用了俗语白话和伎艺格式。

再看“得其兴废”。在编年纪事的叙述框架中,《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抄撮、汇集的书史文传材料虽然来源复杂、属性不同、语体不一,但都会有一根主线牵引、贯穿着,这就是历史兴衰治乱之理,体现为编写者在具体情节中不断地对人物、事件予以评议,即义理化阐发。

当然,那些话本小说和历史演义小说也有评议内容,比如“正是”二字领起的各种诗赞、留文或套语,但这些都属于说书人的常用套语,对历史人物或事件并不具有切实的针对性。而《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的评议内容,无论诗歌类,还是散文类,在来源和格调上都与此不同。

《五代梁史平话》卷上有一段关于唐太宗“贞观之治”的评议,乃参取于元人陈栎的《历代通略》:

正观年间,米斗三钱,外户不闭,马牛孳畜,遍满原野。行旅出数千里之外,不要赍带粮草。蛮夷君长,各各带刀宿卫,系颈阙庭。一年之间,天下死刑只有二十九人。当时恁地太平!^③

是以贞观之治,号称太平,斗米三钱,外户不闭。突厥之渠系头阙庭,北海之滨悉为郡县,蛮夷君长带刀宿卫,天下死罪岁仅二十九人。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④

陈栎《历代通略》撰成于元至大三年(1310),是一部史评类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为《历朝通略》:“是编叙历代兴废得失,各为论断。每一代为一篇,自伏羲至五代为二卷,北宋南宋则各占一卷,盖详近略远之意也。”^⑤这种旨在探求兴衰治乱之理的史评著述乃承《资治通鉴》一脉,在宋元时期颇为普遍,踵续不断。而《五代史平话》中的评议文字,见识相对高远,明显优于后来的“全相平话五种”和历史演义小说,这与编写者参取当时《历代通略》之类的史评类著述有密切关系。另外,《五代史平话》用于评述人物、事件、场面的诗歌或诗句,也不是话本小说那样的习见格套留文,而多是杂采或化用杜甫、白居易、王维、郑谷、邵雍等唐宋诗人的诗歌。比如《五代汉史平话》卷上叙李长者招刘知远入赘为婿,有“正

① 《宣和遗事校注》,程毅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50—51页。

②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八,许沛藻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05—706页。

③ 《五代梁史平话》卷上,《宋元平话集》,丁锡根点校,第24—25页。

④ 陈栎:《历代通略》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5页。

⑤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八,第754页。

是”领起的评议：“门阑多喜色，女婿近乘龙。屏开金孔雀，褥隐绣芙蓉。”^①此诗乃节取杜甫《李监宅二首》其一的四句，只是顺序有调整。又如《五代梁史平话》卷上叙隋炀帝荒淫误国，引邵雍诗评说：“蝼蚁人民贪土地，沙泥金帛悦姬姜（妾）。”^②此乃直接引用邵雍《观隋朝吟》律诗中的颔联二句。

至于《宣和遗事》，它抄撮现成的宋人旧籍更为复杂多样，鲁迅称其“节录成书，未加融会，故先后文体，致为参差”^③。但这些语体参差、来源复杂的材料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旨：徽宗荒淫误国，导致失政亡国、遭受屈辱。比如前集有开启徽宗故事的引语：“今日话说的，也说一个无道的君王，信用小人，荒淫无度，把那祖宗浑沌的世界坏了，父子将身投北去也，全不思量祖宗创造基业时，直不是容易也。”^④后集开篇诗歌则有“宣和往事可嗟伤”“道君骄佚奢淫极”^⑤这样的评议以为照应。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抄引了南宋末年吕中的历史讲义以及刘子翬和刘克庄的咏史诗，来对历史人物事件作义理化阐发。

吕中为理宗淳祐间进士，曾任职国子监丞兼崇政殿说书，《皇朝大事记讲义》是他在理宗朝根据《资治通鉴》编成的一部历史教科书，《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八“史部史评类”著录为《大事记讲义》，言其“事以类叙，间加论断”^⑥。《宣和遗事》即在前后两集的结尾处剪辑、引用了《皇朝大事记讲义》原文以作结：前集末尾部分有“后来吕省元做《宣和讲篇》，说得宣和过失最是当”一句领起的一段七百字的段落（《宣和讲篇》乃《皇朝大事记讲义》其中的一部分）；后集末尾则剪裁了此书的一段百余字内容，指出君王荒政之失给国家与社会造成的灾难，这与《宣和遗事》开篇列述的历代君王荒淫误国所体现的主旨相互照应。^⑦《宣和遗事》这些或明或暗的评议文字的引用，表明编写者确实受到了吕中《皇朝大事记讲义》观念的影响而形成了编写“宣和遗事”的主旨。

除了引用史评类著述以作评说，《宣和遗事》还大量引用文人诗歌来评议历史人物和事件，并且在引诗时多能明标作者。比如前集叙宣和二年（1120）十一月朱勔以花石纲献媚徽宗，引邓肃《花石诗》第十一首；后集结尾处论秦桧错失恢复中原的机会，引刘克庄《题系年录》诗一首。^⑧《宣和遗事》更多的引诗评议则使用了南宋初期刘子翬（1101—1147）的《汴京纪事》组诗。《汴京纪事》共二十首，作于绍兴三年至六年（1133—1136）之间，乃着眼于北宋宣和、靖康年间一个个历史事件片段的省思与咏叹，由此串成了王朝兴衰治乱的图景。刘德岑认为此组诗“慨念故国，伤心禾黍，既痛国家变乱之端，亦识君臣误国之由”^⑨。这在题材与主旨上正契合《宣和遗事》，因此也抄引最多，其中前集引四首，分别是第十二、九、十六、七首；后集引了三首，分别是第十七、十八、二十首。比如，前集叙宣和元年（1119）九月宴蔡京父子于保和殿，以“刘屏山曾有诗记汴京遗事云”引入刘子翬《汴京纪事》第七首以作评议：“空嗟覆鼎误前朝，骨朽人间骂未销。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⑩后集叙及宣和遗事结尾而以诗收束，则连续引用了《汴京纪事》组诗中的三首，第三首正是组诗的最后一首即第二十首：“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衫檀板无颜色，一曲当年动帝王。”^⑪都是借人事盛衰来写兴亡之感，由此寄寓了故国之思与亡国之恨，体现了亲历者对宣和遗事的沉思与评判。

① 《五代汉史平话》卷上，《宋元平话集》，丁锡根点校，第175页。

② 《五代梁史平话》卷上，《宋元平话集》，丁锡根点校，第24页。

③ 鲁迅：《宋元之拟话本》，《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三篇，第82页。

④ 《宣和遗事校注》，程毅中校注，第8—9页。

⑤ 《宣和遗事校注》，程毅中校注，第171页。

⑥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八，第753页。

⑦ 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张其凡、白晓霞整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77、432—433页。

⑧ 《宣和遗事校注》，程毅中校注，第83、318页。

⑨ 刘德岑：《刘子翬〈汴京纪事〉诗笺注》，《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第90页。

⑩ 《宣和遗事校注》，程毅中校注，第77页。

⑪ 《宣和遗事校注》，程毅中校注，第184页。

由此可见,《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这类书面编写,不仅是汇抄旧籍来讲述历史故事,更要对书史文传的材料予以义理化阐发。那些编年纪事框架中的韵体或散体评议文字就是对历史人物事件的义理化阐发,它们就像一条贯穿线,让那些抄录、汇集于此的书史文传材料有了主旨上的统一性。统观而言,这些评议文字,在来源上,取自正统史学领域的史评类著述,或者高雅文学领域的唐宋诗人的咏史诗,而不是那些来源于伎艺领域、沉淀于话本小说或历史演义小说中的说书人格套语;在格调上,不是那些作为童蒙读物而常见习诵的胡曾、周昙等人的咏史诗(这类诗作大多叙述刻板,议论平庸,艺术性不高),而是《资治通鉴纲目》一脉上的那些义理化史学著作以及那些作为历史教学讲义的史评类著述,它们讲究在对纷繁复杂历史事件的梳理中探求兴衰治乱之理。这种述史求理的观念是宋元思想界、史学界的主流(后文详述)。

上面所析《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整体上表现出的三个属性因素——架构上的编年纪事体例,内容上的据史书原文抄录、剪辑或白话翻述现象,以及主旨上的对书史文传材料的义理化阐发,可以看出这类作品系年纪事以见兴衰治乱之理的编写思路,同时也是按照这个思路来汇集书史文传材料以展现历史发展脉络。因此,对于它们的属性论定,就不能简单地依据其中部分情节上、体制上的说书体成分来判断,而应根据这类作品的内容整体来论定其属性:在编年纪事体例的框架上,抄撮书史文传、杂采野史传说而编撰成书,并对这些材料作通俗化处理、义理化阐发。据此而言,它们既不是来自伎艺说唱内容的记录,也不是用于伎艺说唱表演的文本,而是基于书面阅读立场的历史题材的通俗作品编写,只是出于通俗的需要而直接或间接地取用了讲史伎艺的内容和格式。从这个编写立场、取材来源以及处理材料的方式来看,它们属于一种在材料、语体和格式上处于混合形态的通俗历史著述。

三、什么路径走出来的书面编写

据前文所析,可见宋元讲史话本一方面作为小说类型的不纯粹,一方面作为历史著述的不纯粹,总之,它在小说领域和历史领域都是颇为另类的作品形态。这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后世把这类作品归为小说类型或历史著述,乃是基于各自的观念和立场对它们的“去路”安排,那么,它们又是从什么路径走出来的书面编写呢?此即这类作品的“来路”问题。对此问题,前文所述三个属性因素,尤其是抄引《皇朝大事记讲义》《历代通略》这类史评类著述以作评议的成分,提示我们去关注宋元时期史学领域的著述动向。

《皇朝大事记讲义》《历代通略》都是史评类著作,《四库全书总目》皆著录于“史部史评类”。前者是吕中在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根据《资治通鉴》编成的一部历史教科书。吕中曾任国子监丞兼崇政殿说书、肇庆教授等职,此书是他“平日讲论稿本”,“事以类叙,间加论断”^①,因其简明实用,故在宋元时期科举学子中风行一时,广有声誉。后者是陈桷在元至大三年撰成的一部史评类著作,“叙历代兴废得失,各为论断”,是元代一部普及性较强的史书,其所叙史事,乃据《资治通鉴》,所谓“通略”,意指通鉴之大略,所发评论,多取司马光《稽古录》而有增益。而《稽古录》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基础上编撰的一部简明易读的二十卷通俗历史读物,于元祐元年(1086)呈进,《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今观其诸论,于历代兴衰治乱之故,反复开陈,靡不洞中得失。洵有国有家之炯鉴,有裨于治道者甚深。”^②

由此可见,这两部史评类著作都意在述史求理,以见历代兴衰治乱之理。就其编写主旨而言,都属于历史讲义性质的史著。就其表述风格而言,都倾向通俗浅易,因此在当时普及性强,有着广泛的接受人群。而就承续传统而言,则都与司马光《资治通鉴》有关,其中蕴含的按鉴编写、历史讲义、述史求理

① 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八,第753页。

② 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第422页。

等因素,牵涉着宋元时期历史著述关联的一条发展脉线、一个文化语境。

先看文化语境。北宋建立后,吸取了五代武人乱政的教训,采取崇文抑武政策,一个重要的举措是设立经筵,宋太祖、宋太宗都率先垂范,积极参与,并逐渐在宋仁宗时期正式形成了经筵制度。经筵是宋代初年酝酿、成熟的一种面向帝王教育的经史讲读活动,^①有常设的主管机构,最初称为“说书所”,仁宗庆历初改称“讲筵所”;有常设的官职,称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②有规定的讲读内容,一是儒家经典,二是前朝与本朝的历史。比如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二月时的一次经筵活动:“丙辰,御迎阳门,召辅臣观画,其画皆前代帝王美恶之迹,可为规戒者。因命天章阁侍讲曾公亮讲《毛诗》,王洙读《祖宗圣政录》,翰林侍读学士丁度读范《汉书》,数刻乃罢。”^③就经筵讲读内容的构成而言,这是一次具有典型意义的经筵活动,依次讲读了儒家经典、本朝国史和前代历史三大类内容。具体来说,对于那些讲读儒家经典的经筵活动就称为“讲经”,而对于那些讲读史书的经筵活动即专称“讲史”。

经筵讲读活动需要内容适合的经史教材,这引动了许多当职与不当职的文人致力于儒家经典、前代历史的著述阐发,由此而表现出经筵制度对于宋代经史演义内容、风格的引领作用,进而影响了经史学术发展方向的变化。^④比如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此书乃进献君主之作,因而在当时即誉满天下,并以它的诠释体例为典范出现了经典诠释的新模式——“衍义体”。其表现之一就是经世化、通俗化:“为了方便君主阅读,增加阅读的快感,衍义体更加重视故事的体例。……故事体例在《大学衍义》中被广泛运用,在第十卷中,真德秀讲了一个汲黯以憨直冒犯汉武帝故事,来说明‘人臣之义,以忠直为本’的道理,并期望君主从中汲取经验教训。”^⑤因此,《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衍义体“其于经文训诂,大都皆举史事以发明之,不免太涉泛滥,非说经家谨严之体”^⑥,但它对于儒家经典通俗平易的阐释方式和明白晓畅的诠释风格,则促进了经史著述通俗化、经世化一脉的发展。

经筵讲读活动之所以如此讲求平易明畅,乃基于其面向的人群是非学者身份的君主,而这一禀性客观上使它能对更多社会群体具有吸引力,再加上帝王的躬亲表率和社会精英的积极响应所形成的影响力和推动力,经史讲读活动的热潮就自上而下地蔓延、贯穿到更多社会阶层和领域,其讲求通俗平易的禀性也在这个过程中承续下来,尤其到了市井和乡村,经史讲读的内容、风格就更趋平民化、通俗化了。比如宋元伎艺中就有一些讲说儒家经典、蒙书内容的表演节目。《南村辍耕录》卷二五“院本名目”条载,“诸杂大小院本”有《毛诗旦》《孝经孤》等节目,“诸杂院爨”有《打论语》《论语谒食》《擂鼓孝经》《讲道德经》《讲蒙求爨》《背鼓千字文》《变龙千字文》《错打千字文》《埋头千字文》等节目,“拴搐艳段”有《打论语》《千字文》等节目。^⑦这些伎艺领域的讲说《论语》《道德经》《蒙求》《孝经》《千字文》等表演节目,肯定不是学校书院里的严肃讲学活动,而是与唐代专类伎艺俗讲、论议一样,都是缘于严肃社会文化活动的通俗化、娱乐化,进而成为伎艺领域中面向大众文化生活的娱乐性节目或门类。

在这个路径上,我们看到了讲史活动的不断下沉和拓展。当流播范围从宫廷的经筵、京城国子

① 张帆认为,经筵制度正式形成于北宋,是“中国古代皇帝为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张帆:《中国古代经筵初探》,《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102页)。邹贺、陈峰认为:“狭义的经筵指北宋确立的、有专门法规保障、在专门机构组织操作下,由任专门官职的儒生在固定时间、固定场所向皇帝传播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的御前学术讲座。”(邹贺、陈峰:《中国古代经筵制度沿革考论》,《求索》2009年第9期,第202页。)

② 《宋史·职官志二》记“崇政殿说书”曰:“掌进读书史,讲释经义,备顾问应对。学士侍从有学术者为侍讲、侍读,其秩卑资浅而可备讲说者则为说书。”(脱脱等:《职官志二》,《宋史》卷一六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815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六,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544页。

④ 参见姜鹏:《北宋经筵与宋学的兴起》第四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9—134页。

⑤ 朱人求:《衍义体:经典诠释的新模式——以〈大学衍义〉为中心》,《哲学动态》2008年第4期,第68页。

⑥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第23页。

⑦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五,王雪玲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512、516—517、520—521页。

监、各地方的官私学校而扩展到市井社会；当宣讲场合从帝王的宫廷、官员的厅堂、学校的讲堂而蔓延到市井的瓦舍勾栏；当面向人群不断扩展，从帝王宗室到文臣武将，从书院学子到市井大众以至乡村村民，就在宋元伎艺中出现了“讲史书”这样的专门家数。比如南宋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言：“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①吴自牧《梦粱录》卷二〇“小说讲经史”条言：“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②于是，原为教育属性的说书活动就像唐代寺院僧侣的经讲、俗讲一样，被通俗化、娱乐化而成为一门专类伎艺或一个演艺节目，这是经筵制度引领、激励的经史讲读活动在市井社会通俗化、娱乐化的结果。正因如此，史学界有观点认为，“讲史书”伎艺是一种通俗的史学活动，那些讲史话本是一种平民化的通俗史学作品（详见前文）。

由此再具体看当时的史学领域，这种由经筵制度引领的经史讲读的**义理化、通俗平易化**趋向，就在历史著述类群中蕴含着一条**发展脉线**。

关于义理化。元人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言：“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③但这个“史以载道”的教育功能对于帝王和学者来说是不同的。讲史活动在帝王经筵上出现，是帝王学习祖宗家法、镜鉴历史经验的重要方式，这就要求讲官能清晰简明地讲解历史兴衰治乱的因果逻辑，以便让帝王能快速有效地领会、掌握治国理政的道理和方法，此即胡三省所总结的“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④。而在学校书院的讲堂上，讲史活动就被视为一种非常理想的传道方式，就是借讲史而探讨兴亡治乱之道。

经筵讲史和学堂讲史的繁兴直接促进了大量历史著述的出现，尤其是经筵讲读所需要的对本朝先皇圣政的总结和前代历史经验的阐释，这一需求引动众多文人致力于这类历史著述的编写，著名者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范祖禹的《唐鉴》。《资治通鉴》的编写初衷即是给皇帝提供一部可资借鉴的“历代君臣事迹”，最初于治平三年（1066）受英宗委托而立项时亦名为《历代君臣事迹》^⑤；编写者在内容展示的方式和效果上都契合宋代君主讲读史书以资治道的需求，这体现在它以编年体形式清晰地梳理出历史事件发展的因果关系，并明确表达出编写者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认识。《资治通鉴》在问世之后即成为经筵讲席上与儒家经典并列的必读教材，据《宋会要辑稿》，南宋孝宗朝，《资治通鉴》与《三朝宝训》“间日进读”；光宗朝，此二书与《诗经》《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孟子》“分日更进”。^⑥至于范祖禹的《唐鉴》一书，是对唐朝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它与《帝学》同是范祖禹进献君主、用于经筵的史著，作者明确指出其撰写目的是告诫统治者取鉴于唐，取法于祖宗，才是永世保民之道。如此这类祖宗圣训、史鉴著述的大量出现，表明经筵制度对于当时历史著述的重要引领作用。

南宋朱熹编写的《资治通鉴纲目》，在对《资治通鉴》作了更为简要明畅的改撰的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把理学思想融入历史阐释，贯穿以《春秋》惩劝之“义理”，其目的是要为世人提供一部“以适厥中”^⑦的历史教科书。这种述史求理的历史阐释思路在元代理学被定为官学的推动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接受。元代士人群体即广泛传习《资治通鉴纲目》，在他们看来，“此天地之经，君臣之义，而圣贤之心

① 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周峰点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86页。

② 吴自牧：《梦粱录》卷二〇，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周峰点校，第306页。

③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司马光：《资治通鉴》，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序言第28页。

④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司马光：《资治通鉴》，胡三省音注，序言第28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八：“（治平三年四月）辛丑，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光奏曰……诏从之，而令接所进书八卷编集，俟书成取旨赐名。”（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八，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050页。）又，司马光《进书表》曰：“先奉敕编集历代君臣事迹，又奉圣旨赐名《资治通鉴》，今已了毕者。”（司马光：《进书表》，《资治通鉴》，胡三省音注，第9607页。）

⑥ 徐松：《经筵》，《宋会要辑稿》崇儒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894、2898页。

⑦ 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序例，朱熹、赵师渊等：《资治通鉴纲目》，李孝国等注解，北京：中国书店，2021年，第1页。

也”^①，于世教大有裨益，可以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泯。这就使《纲目》的义理化历史阐释思想深入影响到元代各阶层的文人群体。其表现就是各种历史著述尤其是史评类，普遍在历史材料和史评观念上受到《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影响，简言之即按鉴编写，阐释义理——注重通过理析纷繁复杂的历史发展脉络，探求兴衰治乱之理。前文所述吕中《皇朝大事记讲义》、陈栎《历代通略》这两部史评类著述都有其明确的影响痕迹。而《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这些通俗的历史题材编写也是以它们的内容和观念为主要依据，甚至在评议相关人物与事件时明确抄引这些史评类著述，由此可见当时的义理化历史阐释思想影响的深广程度了。

关于通俗平易化。经筵讲读活动从一开始即包含着通俗平易的需求，这是因为经筵进讲所服务的对象是非学者身份、非专业群体的帝王，由此经筵讲读的历史著述在内容和方式上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通俗平易的思路。这个“通俗平易”包括两个方面的需求：一是讲清历史大事的发展脉络和因果关系，二是把历史大事与义理讲清的方式。这就要求儒臣进讲应以简明易懂为旨，正因如此，讲官们都会在进讲或著述时注重经史的内容、义理与讲述方式的通俗平易化。比如宋仁宗时，贾昌朝之所以能持续侍讲经筵，是因为“其诵说明白”^②；孙甫于经筵讲史“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履其间，而听者晓然如目见之”^③；真德秀《大学衍义》为使君主易读易懂，在义理阐述时广泛运用故事体例。因此，那些呈送君主、服务经筵的历史著述，为了合乎要求、合乎目的，就要遵循通俗平易、简明易懂的宗旨。司马光于《资治通鉴》编写已秉持“删削冗长，举撮机要”^④的历史叙述之旨，但在他的另一部史著《稽古录》中，这一宗旨则体现得更为清晰明确。他仍嫌《资治通鉴》卷帙繁重，遂又芟除繁乱，编撰了一部更为简明易读的二十卷通俗历史读物《稽古录》，于元祐元年呈进。此书实为自上古至宋英宗朝历史大事的一部简明历史读本，于关乎国家治乱兴亡者，但叙重要史实，记大体纲要。朱熹对此书大为赞赏：“且如《稽古录》，极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诸王。恐《通鉴》难看，且看一部《稽古录》。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里了。”^⑤

这种讲述历史的通俗平易化思路，在面向经筵的讲史、著史中一直存在，并由于经筵制度的引导力和《资治通鉴》的影响力而波及、贯穿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历史知识普及活动中，也引导了历史知识普及的进一步深化，由此把讲史活动的面向人群从帝王而扩展到同样属于非学者身份的市井民众。在这个方向上，经筵讲史还激励了更多文人对于历史知识普及的参与和接力，由此出现了针对不同层次人群的各类历史读物以及一些致力于通俗平易、简明晓畅地讲述历史的体例与手法。有司马光《稽古录》、吕祖谦《十七史详节》这样的节略类历史著述，有王令《十七史蒙求》、胡寅《叙古千文》这样采用四言韵语格式的韵诵类历史著述，还有吴澄《经筵讲义》、郑镇孙《直说通略》这样的白话类历史著述。它们在内容编排、表述方式上皆表现出通俗平易化的追求和努力，属于经筵讲史引领的历史知识普及风气中出现的历史读物。据此理析，放眼宋元时期整个书面编写领域，就会发现有一条经筵讲史引领的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发展脉线。在此脉线流衍之下，人们用各种方式讲述着《资治通鉴》及其他历代书史文传，或者针对不同层次的人群而进行各种通俗历史读物的编写，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而它们在书面领域里的前后相承也体现了经筵讲史所引领的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思路，对于当时通俗历史读物繁盛簇生的影响之功。

① 揭傒斯：《通鉴纲目书法序》，《揭文安公文粹》卷一，《丛书集成初编》第241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页。

② 南宋吴泳《陈公益授兼侍讲制》记：“昔贾昌朝于景祐元年说书崇政，四年侍讲天章阁，盖以其诵说明白耳。”（吴泳：《陈公益授兼侍讲制》，《鹤林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6册，第64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五，第4467页。

④ 司马光：《进书表》，《资治通鉴》，胡三省音注，第9607页。

⑤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三四，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07页。

结合上述宋元时期历史著述关联的这一个文化语境、这一条发展脉线,再回看宋元讲史话本,其文本形态上的白话表述和伎艺格式,当属于当时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风气流衍下书面编写借鉴伎艺领域口演体制因素的踪迹。只是由于处于草创阶段,这种来自伎艺领域的表述体制并未能与文言体系的书面表述体制调适、融合得恰当,从而出现了伎艺体制与文言故事的混合形态,在作品整体叙述风格上存在着不协调、不融合的剥离感。而伎艺格式能够落实于这些讲史话本,成为一种书面文本的体制性因素和标志性特征,这是书面编写领域发生的事,而非伎艺表演领域需要或发生的事。立足于书面编写领域,这些讲史话本就是一种有着伎艺格式的通俗历史读物,^①它并不是为了服务于伎艺需求而要使用伎艺格式和白话语体,而是基于书面编写的需要而借用或模拟了伎艺的格式和内容。这应是宋元讲史话本的最基本的文本属性,因而其文本才会体现出对来自书面领域、伎艺领域的历史故事和表述体例的组合形态。

归结而言,宋元讲史话本这种文本类型的出现,乃是因应了宋代经筵讲史引领的历史知识普及风气中的通俗历史读物编写;由此再来看前文所析讲史话本的编撰方式有据史书原文的抄录、节略或白话翻述,这些也是宋元历史著述常用的编写方式,而并非讲史话本处理材料、叙述故事的独立创制。只是在宋代经筵制度引领的经史演义通俗化拓展路径上,宋元讲史话本在取材来源和表述方式上并未严格遵守史学著述的原则,这对于史学规范而言就显得不本分,但正是这些不本分因素,成为它们可以趋向话本小说发展的催化剂。但它们最初的出现,决非是为了要发展出纯粹的通俗小说,也不是为了要对讲史伎艺口演内容进行书录整理,而是属于原生性的书面编撰,是立足于书面编写而取用了口头叙事伎艺的体制格套,并与现成的文言史著内容混合而成的通俗历史编写本。

结 语

《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这类编写,并非本然地为了文学领域的话本小说而出现的文本类型,后世把它们放在小说的发展路径上,让其作为历史演义小说的前身或初始,这是以后律前的追认,而不是它们原本所处的发展路径。正因如此,这种类同史抄的文本属性和形态表现,对于文学领域的历史演义小说来说,就显得“不纯粹”——既不能算作纯粹的文学作品,也不能算作纯粹的小说作品。当然,这种所谓的“不纯粹”属性,立足于后世的历史演义小说来看,会显得不正宗,这是把它们放在小说发展路径上的认识;但也提示我们,它们原本不是为了要发展出“纯粹”的通俗小说而出现的文本形态,而是处于非文学领域的历史著述一类作品的发展路径上。

可是,在宋元时期的知识格局中,它们仍然显得非常另类,与当时那些通俗历史著述相比较,也显得不“本分”。因为对照吴澄《经筵讲义》、郑镇孙《直说通略》,虽然它们同是依傍史书编写而成的通俗历史作品,同样有据史书抄录、节略或白话翻述的方式,但《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这种编写,在材料上又使用了说唱伎艺的内容,在格式上又简单地混合了“话说”、入话、散场诗这些属于伎艺口演体制的成分。虽然如此,它们仍然是基于书面阅读而编写的作品,而不是为了伎艺说唱而编写的文本,也不是来自伎艺说唱的书录文本;只是相对于它们所依据的那些书史文传,表述风格上显得更为通俗浅易,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容上,理清历史大事的发展脉络和因果关系;二是语言上,采用便于理解和记诵的韵语和白话。基于此,它们的根本属性仍是历史著述,只是在表述风格上则属于一种通俗历史读物。而在历史著述这个属性上,它们与宋元时期那些“本分”的史著有着共同的因素:在编年纪事体例的框架上,抄撮书史文传、杂采野史传说而编撰成书,并对这些材料作通俗化处理、义理化阐发。这些

^① 胡适认为,《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三国志演义》,都是历史演义一类,“这种演义起初本是一种通俗历史教科书:后来放手去做,方才有不依照旧历史的历史小说”(胡适:《国语文学史》,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6页)。

因素表明,它们的出现与发展关联了宋元时期历史著述、经史阐释的文化语境和承续脉线。

北宋经筵讲读活动的出现,带来了经史阐释方向的拓展与变化。作为一种风气,它促进了经史讲读活动的下沉、蔓延,在口头与书面领域都出现了经史演义的通俗化拓展。作为一种方法,它对历史讲读注重因果脉络的梳理和主旨大义的发阐,引领了宋元历史著述的义理化阐释思路。作为一个分支,它孕育的经史演义通俗化拓展路径,又因面向人群的不同而出现了不同形态,有韵讲的,有白话的,有伎艺的,它们都是经史演义的通俗化拓展路径上出现的不同形态,其中也蕴含着经史演义通俗化路径上的分流。纯粹者尚能遵守历史著述的规范,而不纯粹者则会不守“本分”,逾越规范,比如取材野史传说或伎艺讲说的故事,使用说唱伎艺的格套或体制,这些都是经史演义通俗化拓展而走向异途、流入另类的表现。但也正是如此走向异途的作品,才会在这个通俗化拓展路径上派生、分离出来各种方式、形态的通俗历史编写。它们初始的编写意向仍然是为了依傍书史文传,在历史事件的讲述中来探寻兴衰治乱的道理,而不是为了编写一部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的文学属性的小说作品。所以,虽然它们在取材上、表述上表现出偏离历史著述的不纯粹或说不守本分之处,但在整体的编年体例、按史演义、述史求理等方面,仍然行走在历史著述的路径上。归结而言,相对于当时正统的历史著述来说,宋元讲史话本表现出了不纯粹之处,但对于后世的历史演义小说来说,这不纯粹之处则具有开拓意义,因为正是在这个不纯粹方向上的通俗化编写,才孕育了通俗历史著述脱离历史领域而在文学领域开辟另一洞天的促动因子,由此成为历史演义小说得以生长的起始点和催化剂。

[责任编辑 马丽敏]

Coming and Going: Historical Story-telling Scripts and the Popularisation and Expansion of Historical Novels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XU Da-jun

Abstract: The attributes of historical story-telling script and historical commentaries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involve the preparation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 historical lectures,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history for the purpose of reasoning. They are associated with a cultural context and a line of succession of historical writings at that time. The former is the result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popularisation and entertainment of the reading of history and scriptures in the urban society led by the system of the imperial feast. On the other hand, the latter is the result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reading of history and scriptures led by the system of the imperial feast in the field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form of justification and popularity. Accordingly, the historic story-telling script belonged to the popular history writing derived and separated from the path of popularisa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scriptural and historical performances. Compared with the orthodox historical writings at that time, it still followed the path of historical writings in terms of chronological style, acting according to history, and describing history to seek reason. However, there were deviations from the historical writings in terms of material and expression. For the later historical novels, these irregularities are of pioneering significance, nurturing the motivating factor to break away from the historical field and open up another world in the literary field, and becoming the starting point and catalyst for the growth of historical novels.

Key words: Historical story-telling scripts, historical novel, justification, popularisation

Coming and Going: Historical Story-telling Scripts and the Popularisation and Expansion of Historical Novels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XU Da-jun

Abstract: The attributes of historical story-telling script and historical commentaries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involve the preparation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 historical lectures,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history for the purpose of reasoning. They are associated with a cultural context and a line of succession of historical writings at that time. The former is the result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popularisation and entertainment of the reading of history and scriptures in the urban society led by the system of the imperial feast, giving rise to popular historiographical performances such as the “storytelling of history” and accessible historical reading materials like historical storytelling scrip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latter is the result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reading of history and scriptures led by the system of the imperial feast in the field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form of justification and popularity, resulting in a range of historical writings aimed at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and adopting methods for conveying history in a straightforward and comprehensible manner.

What we now refer to as historical story-telling script, such as *Popular Stories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Anecdotes of Xuanhe Era*, also belong to this body of popular historical writing. These works, in their construction, drew directly from official histories both in source material and in method, including copying, editing, or retelling historical texts in vernacular language, and structuring their narratives chronologically according to historiographical conventions. Accordingly, the historic story-telling script belonged to the popular history writing derived and separated from the path of popularisa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scriptural and historical performances. Compared with the orthodox historical writings at that time, it still followed the path of historical writings in terms of chronological style, acting according to history, and describing history to seek reason. However, there were deviations from the historical writings in terms of material and expression.

Specifically, in order to appeal to popular audiences, these works frequently incorporated elements from unofficial histories, folklore, and the performative traditions of storytelling. Their narrative strategies often blended formal historical prose with performative formulas such as “it is said,” prologues, and closing poems, drawn from oral and musical traditions. These hybrid forms reflect the branch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scriptural-historical popularisation, generating diverse types of popular historical narratives.

Their original intention was not to produce ornate literary fiction but rather to explicate historical events and explore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s of rise and decline. For the later historical novels, these irregularities are of pioneering significance, nurturing the motivating factor to break away from the historical field and open up another world in the literary field, and becoming the starting point and catalyst for the growth of historical novels.